

第一章 導論

台灣和香港均和中國大陸有同文同種、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在上世紀 50 年代後，兩地均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也都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形成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政經環境與生活方式。近年來，台灣統獨議題與香港回歸等事件，使得台港兩地人民的身份認同意向受到更多關注，然而，長期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港商，其與中國大陸當地的接觸時間最久，與當地互動亦最頻繁，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人數持續增加，因此其身份認同的變化，影響台灣和香港民眾的身份認同意向不可謂不大，因此，筆者的研究問題是：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港商，他們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有何看法？仍然維持原生地的認同？抑或是慢慢形成轉變？此議題固然廣受矚目，學者業界也經常關注提及，然而，對於台港商兩者身份認同流動比較，始終未見系統的研究。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針對東莞地區台港商企業進行田野調查，並與現有理論進行對話提出「投資地的社會文化」對台港商身分認同轉變以及融入當地程度過程中將發揮影響力，使得港商的身分產生變遷，而台商則會更珍視自身台灣人的身分。首先，研究過程中，筆者將藉由台港商在「經濟網絡」中的(1)政商關係、(2)產業網絡；「社會網絡」中的(1)人事管理、(2)日常生活；以及「生涯規劃」(1)「置產與退休生活」、(2)「子女教育」幾個指標，並藉由 2008 年田野訪談逐步觀察這些指標是否對於產生台港商不同的變化，最後，透過與理論進行對話，初步發現，由於港商與投資地社會文化相近，因此使港商身分認同發生變遷，但對於與當地不同社會文化的台商而言則會更珍視自身「台灣人」的身分，形成「台灣人」的小圈圈，阻絕大陸人的加入，無法融入當地人的社交網絡。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 台港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情況

自 1978 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外資一直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從外資來源地觀之，來自海外華人聚集的國家或地區的資本，即所謂海外華人投資，尤其是港台資一直佔據著主導的地位。¹ 其中港商投資的時間最久，據美國時代雜誌報導，當八 0 年代中國對外開放時，香港的製造業是最先投資中國的產業。² 台商也因 1980 年代晚期開始，政府開放台灣人民赴中國大陸探親，並逐漸解除相關法令限制，使得兩岸開始實質的經貿來往，台商逐步投資大陸，二十多年來，兩岸經貿持續擴張，加上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有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的趨勢，當兩岸加入 WTO 之後，經貿關係愈見密切，台商不斷投資大陸的趨勢下，帶動了大陸市場對台灣原材料需求擴大，使得彼此間的貿易額逐年增加。以下分別就台商與港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情況作一說明：

(一) 台商投資中國

根據台灣陸委會統計，2008 年 1~7 月兩岸貿易總額為 664 億美元，台灣對大陸出口額達 473 億美元，出超 281 億美元，³ 自 1991 年到 2008 年 7 月累計，台灣經官方核准赴大陸投資金額逾 704 億美元，核准件數達到 36,959 件，佔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總額比重 56.31%，高居第一位。⁴ 此外，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逐年增加，1984 年僅有 1.06%，到 2008 年 7 月已達 21.64%，其中出口比重

¹ Smart, Alan, 2000. "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S. M. Li & W. S. Tang, eds., *China's Regions, Polic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² 賀靜萍，2007，〈大陸黑心玩具 全球大落跑〉，《工商時報》，<http://news.money.chinatimes.com/CMoney/News/News-Page/0.4442,content+120603+122007082000385.00.html?source=rss#>。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2 日。

³ 資料轉引自〈兩岸貿易金額之估算〉，《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88 期，<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88/6.pdf>。

⁴ 資料轉引自〈我國對外投資統計〉，《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88 期，<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88/13.pdf>。

占 30.07%，進口比重占 12.78%，目前，中國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⁵

隨著兩岸經貿交流的逐步開展，愈來愈多的台商與台幹，遠赴對岸謀生就業，對台灣年輕人而言，該不該到中國工作已經不是新鮮話題，外商、台商不斷到中國市場進行策略佈局，形成對台灣人才的強大吸力，根據海基會在 2006 年所做的統計，目前有家人在中國大陸投資、工作或居住者，佔全國總人數的 15%，曾在中國大陸居住超過三個月者則有 17%，⁶ 可以想見，若未來三通實施，往返兩岸的台灣人將更絡繹不絕。因此，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一方面為台灣產業創造一個延續生存的場域，一方面也為西進投資的台商創造了立足全球的機會。

在兩岸間高度流動的這一群人，魏鏞稱之為「聯鎖社群」(linkage community)，魏鏞認為：「雙方國家的一方之內，與另一體系的人民及社群具有廣泛的社會、文化、商業或其他形式的接觸，導致他們跨越體系界線而發展出與另一體系中的人民及社會相互接觸的雙方人民，便可視為彼此的『聯鎖社群』」。⁷此概念經耿曙進一步修訂為「連綴社群」，耿曙認為，兩岸既屬同文同種，台灣人一旦面對大陸人，將自然水乳交融，台灣認同必將無招架之力，最終灰飛湮滅，因此，帶時間一久，「連綴社群」的成員，或將融入對岸社會，或將扮演兩岸橋樑，將雙方綴為一體。⁸此外，耿曙以從田野調查過程中發現，近年湧入大陸的台灣人，往往表現出「國家認同淡薄」及「彼此界線泯沒」的特徵，他們已經開始努力將自身融入大陸的社會中，早期對當地人的種種歧視心理，也逐漸消弭。⁹

⁵ 資料轉引自「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貿易之比重」，《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88 期)。
<<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88/8.pdf>>

⁶ 馬岳琳，2007，〈上班族的中國愁〉，《天下雜誌》，2007 年 4 月 25 日，頁 113。

⁷ 魏鏞，「邁向民族內共同體：台海兩岸互動模式之建構、發展與檢驗」，《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10 月)，頁 1-55。

⁸ 耿曙，2003，「連綴社群：WTO 背景下兩岸民間互動的分析概念」，載於許光泰、方孝謙、陳永生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政大國關中心，頁 57~87。

⁹ 耿曙，2002，4 月，〈『資訊人』亦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論文發表於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研究所主辦之「第二屆政治與資訊」研討會，宜蘭。

(二) 港商投資中國

截至 2006 年底，港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累計設立新資企業 276,449 家，實際投入金額 3091.78 億美元，2006 年港商對中國大陸投資佔全中國的 37.4%，雖然自 90 年代後，港商投資中國大陸佔中國外資的比例逐漸下降，但在新設企業或是投資中國的金額上，均位居所有外資之首（如下表一）。

表 1 1990~2007 香港對中國大陸投資情況一覽表 單位：億美元

年度	新設企業		實際使用外資	
	香港	比重(%)	香港	比重(%)
1990	4751	65.3	188.0	53.9
1991	8502	65.5	240.5	55.1
1992	30781	63.1	750.7	68.2
1993	49134	58.9	172.7	62.8
1994	24622	51.7	196.7	58.2
1995	17186	46.4	200.6	53.4
1996	10397	42.3	206.8	49.6
1997	8405	40.0	206.3	45.6
1998	7805	39.4	185.1	40.7
1999	5902	34.9	163.6	40.6
2000	7199	32.2	155.0	38.1
2001	8008	30.6	167.1	35.7
2002	10845	31.7	178.6	33.9
2003	13633	33.1	177.0	33.1
2004	14719	33.7	190.0	31.3
2005	14831	33.7	179.5	29.7
2006	15496	37.4	202.3	32.1
2007	16208	42.8	277.0	37.1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台港澳司，

<http://tga.mofcom.gov.cn/aarticle/jingmaotongji/jingjxx/200704/20070404538102.html>

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港商陸續北上投資，因此港商投資大陸的時間較一般外資為久，據美國「時代」雜誌報導，當八十年代中國對外開放時，香港的製

造業是最先投資中國的產業。¹⁰ 香港回歸後以及 2003 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簡稱「CEPA」）的實施，港商有了「港府」這個中介變項，亦即港商投資有「官方」的強力後盾，也更加突顯港商相較於其他外商的優越性，中國各地方政府也可以循官方管道向港商招手。此外，因歷史與地理因素，港商與外國的接觸較多，具有國際視野，因而更能瞭解海內外市場的變化，對於時勢與政策也比其他外商更洞見觀瞻，例如去年沸沸揚揚的加工貿易新政的事宜，最後雖平和落幕，但台企聯會長張漢文也指出早期台商常有過於輕忽時勢與政策的盲點，直到中國官方政策宣布之後才驚覺，而港商早就開始進行準備。¹¹ 由此可知，港商除了在地緣人緣方面具有優勢之外，港商也具備緊跟市場、訊息敏銳、靈活善變，善於捕捉市場需求的優勢，但卻導致缺乏產業資本與經營資源累積的長遠視野。¹²

自 1980 年代開始，台商與港商紛紛前往中國大陸投資，起初均是以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為主，直到 90 年代中期以後才有比較明顯的不同。和其他外商比較，港商和台商都憑藉著地理環境接近、與中國有密切人文與血緣關係的雙重優勢下投資中國大陸。再者，北上投資與工作的港商港幹佔香港整體就業比例的 7.2%，有 29 萬的香港人長居中國大陸，¹³ 均與台灣的情形類似。因此，對香港而言，港商的身份認同變化可說直接與間接影響到「一國兩制」的成敗；對台灣而言，台商身份認同的變遷更是影響未來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現階段研究台、港商比較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見，阮雙儀從對中港擴大經貿往來後，港人認同是否改變之議題進行深入之田野訪談研究，其中雖有部分調查案例涉及

¹⁰ 賀靜萍，2007，〈大陸黑心玩具 全球大落跑〉，工商時報，<http://news.money.chinatimes.com/CMoney/News/News-Page/0.4442.content+120603+122007082000385.00.html?source=rss#>。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2 日。

¹¹ 賀靜萍，2007，〈反應落後港商，台商學教訓〉，工商時報，<http://times.hinet.net/news/20071012/mainland/682b51300acf.htm>。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2 日。

¹² 劉仁傑、封小雲，1996，《亞洲巨龍：台、日、港投資大陸風雲錄》，頁 310-316，台北：遠流。

¹³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6，〈香港願景 2012：邁向可持續和共融的社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ttp://www.hkcss.org.hk/prs/SocialVision2012/crossborder.htm>。檢索日期：2008 年 5 月 25 日。

港商，但並沒有深入探討其在中國大陸經商的實際情況；¹⁴楊春、廖海峰也對東莞台、港商產業集聚現象進行比較分析，但只著重在經濟、產業佈局上做出比較研究，¹⁵因此，目前針對中國大陸台、港商身分認同的比較研究尚不多見，也更促使作者研究此議題之興趣，而台港商在諸多客觀條件均類似的情形之下，其身分認同流動為何，值得我們關注。

在與中國的互動上，不論是經濟或政治，香港均比台灣「先行一步」，因此香港經驗對台灣彌足珍貴，值得吾人仔細探討，以因應未來兩岸之變局。香港與中國比鄰而居，在 2003 年又開放了港深（香港、深圳）24 小時通關的政策，使得港人可隨時進出香港與中國大陸，此外，2003 年中港簽訂 CEPA，給予港商更多的經濟優惠。反觀台商因兩岸目前處於「政治疏離，經濟融合」¹⁶ 的局面，在缺乏官方基礎上，兩岸之間經貿議題一直裹足不前，「三通」議題也一直懸而未決。然而，在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以及中國崛起之種種客觀條件下，「三通」已是台灣經濟能否再度起飛的關鍵所在，也有超過 70% 的台灣人贊成開放三通。¹⁷ 若未來三通實施後，台商通關將更為便利，往來兩岸的時間也將大幅縮短，經濟上也會有莫大的助益。

兩岸關係能否有所突破，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之觀感至關重要，從台灣民眾身分認同的變化便可藉此瞭解。再者，鮮少有學者對港商議題進行研究，更增加筆者對台港商身分認同議題之好奇心與研究動力，故筆者乃以「中國大陸台港商之身分認同流動比較」為研究主題，瞭解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登陸工作的台、

¹⁴阮雙儀，2006，〈麵包換愛情？中港經貿往來對港人認同之影響〉，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亞太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¹⁵楊春、廖海峰，2006 年，7 月，〈東莞市港資與台資產業集聚對比研究〉，論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地理科學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五屆產業集聚與區域發展國際學術會議」，北京。

¹⁶ 吳玉山，1997，《抗衡與扞從：兩岸關係新詮釋》，頁 159，台北：正中。

¹⁷ 資料轉引自：〈台灣民調顯示多數贊成三通〉，BBC 中文網：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2360000/newsid_2361500/2361599.stm。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2 日。

港商其身分認同是否能跨越國界的束縛？是否能融入當地？其身分認同是否發生變遷？又是因為台、港商何種特質的不同而導致其身分認同變遷之差異性？

第二節 台港商特質異同比較

台港商早期進入中國投資的原因、地點、產業結構等因素均類似，故以往的研究都將兩者視為一個整體，較少對其進行對比分析。¹⁸ 但實際上，台港商在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組織的差異以及與當地社會網絡之關係等都有截然不同的發展趨勢與特質，筆者分述如下。

(一) 產業結構與組織

台港商投資中國大陸初期(在港商為 1980 年代、在台商為 1990 年代上半期)，兩者有相當大的同質性，例如：(1) 投資規模：均以中小企業為主；(2) 產業選擇：均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勞力密集型製造業；(3) 投資地點：均集中在東南沿海的珠三角一帶，尤其是珠三角的廣東省。¹⁹ 近年來，由於母地區不同的產業升級過程，台商與港商的產業結構開始出現不同的轉變。

台商西進可分成三個階段，早在台灣 1987 年解嚴之前，就有許多台商利用各種管道進入大陸。解嚴後，數以萬計的台商更前仆後繼地向珠三角一帶遷移，時值台灣土地、勞動力成本提高，傳統產業生存空間日益狹窄，為了延續企業生命，加上中國大陸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對台商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產生了第一批西進的台商。本時期西進者多以獨資形式為主，合資方式為輔的中小企

¹⁸ Yang, Chun. 2007. "Divergent Hybrid Capitalism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Electronics Clusters in Dongguan." *Economic Geography*, Vol. 83, No. 4, pp. 395-420.

¹⁹ 張傳國，2006，〈台商與港商對祖國大陸投資的戰略比較〉，《台灣研究》，第 83 期，頁 23-28。

業，從事紡織、家具、製鞋等勞力密集產業。

1990 年代中期，隨著沿海投資環境逐漸成熟，第二批台商夾帶著高技術性的電腦週邊產品與零組件工廠也紛紛登陸。台灣產業西移的第三波在 1990 年代末成形，此時期進入中國大陸的企業多是夾帶著雄厚的資金與高科技的大型企業，期望藉由立基中國而放眼世界。²⁰ 台灣在勞力密集型製造業遷移後，開始進行產業升級至高科技為主的電子製造業，因此台商在大陸的投資也逐漸從勞力密集型的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至以高科技為主的電子製造業。²¹ 製造業佔台商投資比重的 85% 以上，而且高科技製造業的比重日漸提高，傳統製造業比重則逐漸下降。²²

相較台商，港商則在 1980 年代開始製造業北移後，由於香港本身並未如台灣一般，進行製造業的產業升級，而是轉向以服務業主導，因此在大陸投資的港商，也不存在類似台商早晚期涇渭分明的趨勢，大多仍保持勞力密集的特徵，自 1990 年代後，隨著香港本地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港商開始轉向服務業投資，近年來由於沿海地區土地與勞力成本逐漸提高，勞力密集型製造業的誘因逐漸下降，再加上 CEPA 的實施，香港服務業可以比其他外商更容易進入中國市場，令港商更樂意投資服務業，因此港商投資有逐漸向服務業轉移的趨勢。²³ 根據統計，2006 年港商在服務業的投資約佔總量的 38.6%，比 1998 年上升了 15.2%，2007 年 1-5 月份，港商投資服務業的比例更上升至 50.4%，²⁴ 這說明了港商在服務業領域的投資快速增長，開始與台商出現顯著的差異。

²⁰ 金伯生、聶平香，2006，〈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現況與發展趨勢〉，商務部網站：

<http://big.nbfet.gov.cn/lly/detail.phtml?newId=57357&big5=0>。檢索日期：2008 年 1 月 31 日。

²¹ 楊春、廖海峰，2006 年，7 月，〈東莞市港資與台資產業集聚對比研究〉，論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地理科學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五屆產業集聚與區域發展國際學術會議」，北京。

²² 張傳國，2006，〈台商與港商對祖國大陸投資的戰略比較〉，《台灣研究》，第 83 期，頁 23-28。

²³ 楊春、廖海峰，2006 年，7 月，〈東莞市港資與台資產業集聚對比研究〉，論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地理科學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五屆產業集聚與區域發展國際學術會議」，北京。

²⁴ 王軍，2007，〈近年來香港在內地投資的主要特點〉，《中國外資》，第 166 期，頁 12-13。

在產業組織上，台商與港商也有相當大的不同，台商投資大陸往往具有產業集聚特性，中小企業集體合作，邀請上下游工廠共同投資，在特定地區集聚，形成上下游聯動、配套完善的產業集聚。²⁵ 例如張家銘、吳翰有(2000)兩人觀察台商在蘇州的投資時也發現蘇州地區的台商，往往不是單獨行動，而是整個協力生產網絡的遷移，中心組裝大廠帶著配套生產的中小廠一起到當地落戶，形成一種「母雞帶小雞」的型態。²⁶ 此外，與台商強調合作相比，港商通常都是獨立做事，不需和其他人合作，便可獨立生產產品。港商往往著眼於較低的生產成本、快速變化之商業機會的把握進行投資，在如此的競爭策略下，常忽略長遠的產品創新與技術創造，以短期的合同較多，缺乏長期的聯繫，多以「單打獨鬥」為主。

27

(二) 與中國大陸之社會網絡關係

一般來說，學者們常把台商與港商歸類為「華商」，原因是台灣和香港大多數具有華人血統，與中國大陸有直接或間接的血緣與人際關係。這種關係也影響到兩者投資中國大陸時與當地的政企關係以及社會網絡的聯結程度。對台灣人民而言，除原住民外，台灣地區的人民都與中國大陸有或多或少的關連，所不同的是早晚移民時間及本省與外省混血的程度而已，客觀而論，台灣人與中國大陸有不可否認的同種同文關係。台灣雖然在中共建政後便與中國形成兩岸分治的局面，但國民黨卻藉由強化中國傳統經典文化、中華歷史根源性等教育方式保持了

²⁵ 金伯生、聶平香，2006，〈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現況與發展趨勢〉，商務部網站：

<http://big.nbfet.gov.cn/llyj/detail.phtml?newId=57357&big5=0>。檢索日期：2008年1月31日。

²⁶ 張家銘、吳翰有，2000，10月，〈全球化與台資企業生產協力網絡之重構：以蘇州台商為例〉，論文發表於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辦之「全球化、蘇南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研討會，台北。轉引自：張家銘、江聖哲，2007，〈蘇州台商的政企關係—制度鑲嵌與比較觀點的考察〉，《政治學報》，第44期，頁25-65。耿曙、林家煌，2008年4月，〈登堂未入室：信任結構、協力網絡與臺商產業群聚的模式〉，《社會科學論叢》，第二卷第一期，頁91-126。

²⁷ 楊春、廖海峰，2006年，7月，〈東莞市港資與台資產業集聚對比研究〉，論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地理科學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五屆產業集聚與區域發展國際學術會議」，北京。

台灣人民對「中國」之系脈關係的記憶性意識，顯示了台灣和中國藕斷絲連的心理基礎。²⁸

對香港人民來說，香港人與中國大陸的聯結比台灣人更緊密。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正式佔領香港後，港英政府並沒有劃定封鎖邊界以避免中國人進入香港，香港仍是一個可自由出入的移民社會。由於鄰近大陸，香港從以前就是廣東省人民逃難的避風港，難民往往在中國遭遇戰亂時遠離家鄉來到香港，和平之後再度回到中國內地，因此人口數時而暴增、時而驟減。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量的華人從廣東省遷居到香港，據統計，1949年底已增至230萬人，這還不包括非法偷渡的人口，因此港英政府自從南京條約簽訂後首度封鎖中港邊界，禁止華人自由進出香港。自此，香港和中國成為兩個世界，人口也不能大量流動，原先將香港當作暫居地的難民，他們不再是過客，而是第一代香港居民，對他們而言，與家鄉的聯絡幾乎完全中斷。²⁹ 1978年改革開放後，許多省分都希望港商前往投資，但港商還是選擇了廣東省，一是因為廣東省離香港近，二是因為廣東省語言相通，三是因為鄧小平選擇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所以港商北上投資，將原本斷裂的粵港關係再度連結，令兩地再度密不可分。

由上可知，台灣人與香港人與中國大陸均有密切的人文和血緣關係，因此台商投資中國，均可以被認為是與中國大陸斷裂的情感再度連結。然而，就台商早期投資的廣東省而言，台商比台商在當地有更緊密的人文社會網絡關係與文化傳統，擁有相同語文、文化背景之「既有社會網絡」，使台商在當地投資更加順利。反觀台商則無此種背景，因此需要在當地「新建社會網絡」以方便進行投資。社會網絡建立模式的不同成為台商與台商投資最主要的差異之一。

²⁸ 李美枝，200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意識〉，《本土心理學研究》，第20期，頁39-71。

²⁹ 冼玉儀，1997，〈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載於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頁158~196，香港：三聯書店。

承上所述，筆者將台港商特質的異同點整理如下表 2：

表 2 台港商特質異同比較表

相似處	① 投資規模均以中小企業為主 ② 均以勞力密集之製造業為主 ③ 早期投資地點均集中在珠三角的廣東省一帶 ④ 均與中國大陸有直接或間接之血緣與人文關係	
相異處	台商	港商
	從傳統製造業升級至高技術層面之電子製造業	從傳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投資
	上下游聯動之產業集聚特性	「單打獨鬥」為主
	新建之社會網絡	既有之社會網絡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題為「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港商，其身份認同是否有所改變？其認同變化的原因為何？」嘗試利用當地社會文化作為影響身分認同的自變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各項指標的建立以及選擇台港商最集中投資的珠江三角洲：東莞市為田野調查地點，驗證社會文化在台港商身分認同的轉變力量，同時影響其融入當地的程度與可能性。

一、 研究假設及架構

綜合上述說明，本研究的假設為：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港商因「投資地社會文化」的不同，而影響兩者的身份認同變遷。換言之，上述假設中的相關變項如下。

(一) 研究假設

1、依變項：認同變遷

首先，在依變項方面為台、港商是否有「認同變遷」的情形產生。「認同變遷」指的是台港商是否有「長期定居打算？」亦即台港商對現在或未來的生涯規劃是否有長期定居中國的打算？若台港商被當地吸引、久居當地，並計畫安頓停留，主動進行環境適應，則可表示台、港商有認同轉變的可能性。

2、自變項：社會文化；

中介變項：交截分類狀態(Cross-Categorization)

企業與當地文化距離與區隔程度在在影響到企業成員是否長駐當地的打算，也影響了企業成員是否容易融入當地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自變項「社會文化」指的是台港商與投資當地的語言、文化的不同，是否影響其未來的生涯規劃？若投資者與投資地的文化相近似，交截分類狀態(Cross-Categorization)便能產生作用，使得內團體（台、港商）與外團體（當地社群）之間的分類與偏見逐漸消弭，進而影響其認同變遷的可能性。

以廣東省東莞的台、港商為例：對港商而言，粵港兩地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與歷史傳統，在語言方面，兩地有相同的方言（廣東話），因此，在廣東地區投資的港商與當地容易產生「交截分類狀態」(Cross-Categorization)，使得港商與當

地的分期與偏見降低，令港商較易融入當地社群，也因此增加其身份認同轉變的可能性；相較於港商，雖然台灣的官方語言（國語）與中國大陸官方語言（普通話）相同，但在投資地廣東地區，台商既沒有與廣東地區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背景，也沒有與廣東地區相同的方言，因此「交截分類狀態」對台商產生的影響不若港商強烈，因此台商往往會與當地顯得格格不入，兩岸長久分離產生的隔閡也不易消除，從而減少了台商身份認同變遷的可能性。

（二）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本研究便可針對研究的依變項進行解釋，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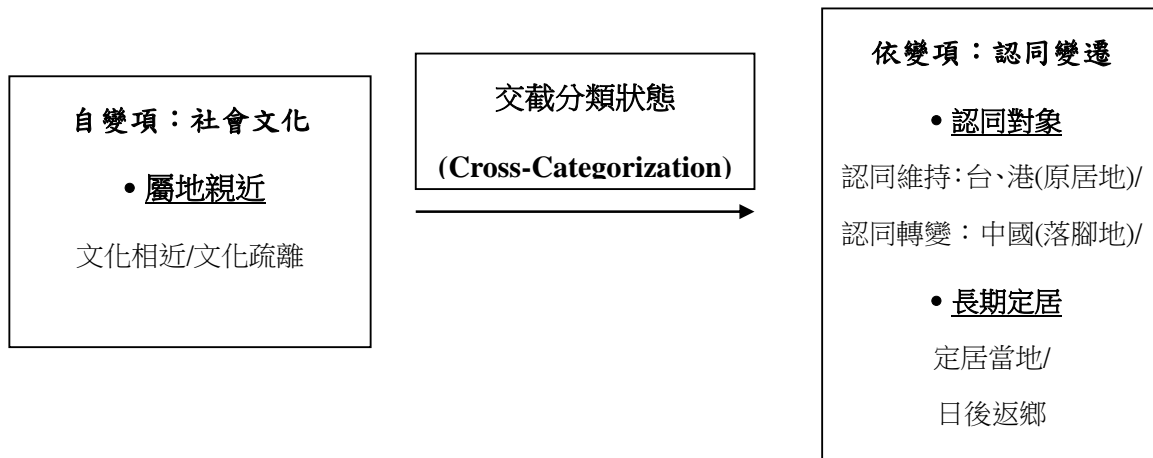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二、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式，將於珠三角地區的東莞市，針對當地之台港商社群實地進行田野調查，蒐集質性資料。由於「認同變遷」是個人主觀的心理狀態，除了具有隱蔽性和敏感性外，也容易受到社會脈絡的影響，亦即容易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外，對東莞地區為數眾多的台、港商進行關於認同變遷的量化研究具有高難度，因此，在資料蒐集方式上，筆者預計將結合「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及「半結構式的訪談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等兩種方法，瞭解投資地文化因素與台、港商認同與融入當地的因果關係，讓田野資料更加完善。就受訪個案的選擇上，為顧及本研究的樣本代表性，筆者預計將依自變項設定的不同屬性台港商企業進行適當訪談人數的篩選；至於受訪個案的來源，則需透過自身親友、當地的台商協會、社區管理委員會、地方官員及企業家等人牽線，以介紹適合受訪之個案。

在資料蒐集程序上，筆者預計先進行深度訪談，瞭解個案於企業內部的工作內容以建立初步架構，接著訪談受訪個案的生活史，包括工作上與生活上；其次的問卷訪談則進一步考量問卷之答案，與深度訪談之回答是否有何異同。就實際訪談之程序而言，在「深度訪談」部分首先將著重於化解受訪個案可能存有的疑慮與防備，其目的是使受訪個案了解筆者的研究內容及研究目的，解答受訪個案對研究本身的各項疑問，以使受訪個案終能暢所欲言，提供筆者所需要的所有研究資料。

接著，筆者將先請受訪個案簡介於企業內部工作職稱、內容等，透過這些經驗以建立本研究的資料架構，進一步則繼續觸及受訪個案的「生活史」(life history)，由其生活史開始，以探討受訪個案於工作中及生活中與陸幹相處的種種經驗。在這方面，本文擬請受訪個案介紹其個人工作背景、對企業內管理制度印象、與當地幹部接觸之經驗，包括工作上或非工作上等等；在訪談進行中，筆

者將時時鼓勵受訪個案抒發其感觸。在深度訪談結束後，隨即進行第二階段的半結構式問卷訪談。先由筆者依照問卷預先擬定的題目逐項提請受訪個案回答。在問卷訪談進行中，筆者並將時時參照前一階段深度訪談所得的內容，如果發覺兩者之間有任何相關性，筆者將提請受訪個案一併說明解釋；若是在兩階段訪談中所獲得的答案之間，有任何出入之處，則筆者將針對該議題深入詢問受訪者，以求徹底釐清受訪個案之確實意見。(訪談大綱請見附錄一)至於所得之問卷資料，與訪談過程中所獲之訪談錄音及「田野筆記」(field-notes)，則帶回騰清後再進行質性分析。

三、 研究範圍及限制

就「影響身分認同轉變與否」議題而言，其所涉及的範圍甚廣，包括其他可觀察或不可觀察的面向，如前所述，雖然本研究的目的在補足前人研究中缺少的台港商身分認同比較的研究，但此優勢也可能變成本文不足所在，因此在這類議題所涉及的相關層面極為廣泛下，筆者考量自身能力後，僅將研究範圍限制於在地社會文化對台港商產生何種影響。

就研究限制而言，本研究採用田野調查法的限制，包括受訪個案之意見是否足以代表多數台商與港商的看法，以及受訪者願意透露個人身分認同及與當地互動之情形；筆者以為，儘管本研究有上述兩點限制，但田野調查法已是現存研究方法中最宜於採行的方式與最適當的研究途徑；筆者除將利用所有管道慎選適合之受訪個案，及盡力促使受訪者透露足夠的資料，對於田野調查不足的部分，並將輔以文獻分析，相信必能將研究限制降到最低，以確保本研究之品質。